

对身体哲学的本源追问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

李耕¹,何俊²,周文莲¹

(1.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2. 保险职业学院公共课部,湖南长沙 410114)

[摘要]在现代西方社会,体育已不能简单定义为一种纯粹意义的游戏、休闲和锻炼身体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体育仍然没有逃离以生产力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西方现代体育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将这种批判进行了完全的控诉,这种控诉不仅仅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体育的控诉,也包括了身体活动本身。事实上,异化的身体活动使人压抑,而回归到身体本身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命题。

[关键词]身体哲学;批判;异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5-0074-06

Origin of Body Philosophy: Research Perspective Based on Marxism

LI Geng¹, HE Jun², ZHOU Weilian¹

(1.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Public Course Department, Insurance Professional College, Changsha 410114,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western society, sports can not be simply defined as a pure sense of play, leisure and physical exercise, in a sense, modern sports still do not escap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roductivity-oriented capitalist system. The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have carried on the thorough critique to the western modern sports, and this kind of criticism has carried on the complete accusation, which includes both the accus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ports and the physical activity itself. In fact, the alien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makes people depressed, and the return to the body itself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body philosophy; criticism; alienation; Marxism

在身体哲学日渐兴起的今天,什么是真正的身体运动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何通过对身体哲学的反思还原本真的体育精神,是当代身体观的最重要的哲学命题。

身体运动与生产方式存在密切的联系,从石器时代开始就一直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体运

收稿日期: 2018-06-09

基金项目: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耕(1972-),男(苗族),湖南娄底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管理哲学;
何俊(1979-),男,湖南道县人,保险职业学院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周文莲(1979-),女,湖南涟源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

动应该是一种生产的过程。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指出,身体是不可信赖的,因为其是人们追求知识、智能、真理、正义和成就美德的阻碍。柏拉图也把身体称为“无知的身体”,因为它阻碍灵魂寻找真实的智慧。在《斐多》篇中,柏拉图借用苏格拉底之口说:“灵魂有肉体陪伴,肉体就扰乱了灵魂,阻碍灵魂去寻求真实的智慧了。”我们的身体总是充满着欲望、烦恼、疾病、本能、冲动和恐惧,我们的灵魂因这些因素的不断干扰而无法得到宁静和思考。“一个人的心灵一旦被主宰激情完全控制,他的生活就会变得铺张浪费,纵情酒色和放荡不羁。”^[1]因此,人类只有尽量地不利用自己的身体,保持自身的纯洁,不沾染肉体的情欲,才能获得知识与智慧,成就美德。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们的身体是不洁的,体育是为基督教神学服务的。为了凸显上帝的全能和自由意志,上帝成了体育的根据和原因,或者说成了这一根据本身。阿奎那指出,人的灵魂的创造并不先于身体,“上帝是以最佳的安排生产人的身体的”,以此来实现灵魂与其身体本身和各方面的相互匹配,灵魂与身体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不存在先后顺序。

在笛卡尔看来,人体运动依靠心脏内的血液,而运动的器官是肌肉,感觉器官是神经,因此人的身体不过是一架机器而已;不必设想除血液与血气之外有什么设备或感觉的灵魂抑或所谓的运动基质。人体这架机器里的身体职能,犹如一块表或其他机器的运动是由摆锤和机轮而产生的一样,都是由器官的安排而发挥作用的。当然,为了摆脱身心二元论的理论困境,笛卡尔又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笛卡尔说是上帝安排了心灵与身体的相互一致性。如果从这一理论出发,不难看出,体育异化的内核就是把身体看作一架机器。

一 马克思对身体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要理解人类社会新基础,就要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与融合。^[2]黑格尔哲学认为,我们既不能接受休谟强加给人类的狭隘的经验主义的限制,也不能接受康德关于我们绝不能看到超越“世界表象”的结论,而应该有力地驳斥先前哲学家强加给人类理性的限制。黑格尔认为应该用复杂的人类知识改善人类生活的始终,特别是人类所处的

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马克思在继承了黑格尔这一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和外在世界建立联系的观点。人自身只有与外在世界发生关系,人类思维才能实现对外在世界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是人认识外在世界的方法,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身体运动的本质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建构的社会形态决定的。在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形态里,生产资料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劳动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成为一种独立于生产者之外的力量,并与劳动者相互异化。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之间的异化关系就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

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的对象化既是对客体的失去,也是对客体的束缚,身体活动的实现成为身体活动的主体失去其自身的发展的过程。劳动过程或者说身体活动的过程被一一异化。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环境下,身体的运动如体育当然也不例外。

身体强壮的体育运动员本应去探索与追求他们身体的极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身体强壮的运动员很容易被塑造成一种体育运动的产品或客体,他们对于身体的极限的追求并不是其自身对于身体极限的需求,而成为一种受市场营销所影响的被异化了的产品。市场需求成为影响体育运动员自身发展的某种力量,从而导致体育运动员本身与体育活动相异化,人与运动本身相异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而如何实现“完整的人”,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人类社会一旦出现分工,一切人都将成为某种具有特殊活动范围的个体,而这个范围是外界强加给他(她)的。只要他(她)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她)就始终应该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或者说他(她)是一个渔夫、牧人或猎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人们才可能根据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每个人才可能在任何环境下得到发展,没有了特殊的活动范围,我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总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

不难看出,马克思认为,人要实现其完整性,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里,人才能脱离束缚,成为真正的人。在现有的社

会形态中,运动员始终必须通过特别的训练才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尽管训练过程严格、乏味,但因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荣誉,所以人们认为这一切是值得的。从这一层面上看,体育运动员及其自身的异化是与时代相互吻合的。随着体育运动专业化时代的到来,人变得越来越“机械化”,运动员变成了体育这台机器上的齿轮;体育运动成为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赛场是工厂,运动员是工人,而产品就是成绩,利润则是比赛背后的巨额财富。

值得庆幸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体育的批判是彻底的。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体育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次的体育竞技场上,都充满着不同形式的经济、政治需求,因而对体育的批判应该像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批判那样不遗余力。体育无法从我们社会的集合体中剥离出去,对体育的批判应该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前提的批判。现代西方社会体育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第一,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中,资本为了追求其自身的最大利益,往往会对运动员采用工具化的训练方式,而这种训练方式最终塑造的当然是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的工具理性。正是在这样高强度的工具化训练方式、训练计划、训练目标下,运动员的运动成绩被推向一个个人类运动成绩的巅峰;而运动员和教练员在赢得这一荣耀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得身体运动本身与身体运动者相互背离。

二 对西方身体哲学的现代性解读

19世纪末期,当美国的体育环境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如体操、舞蹈、竞技比赛以及球类等主要是作为一种身体活动而存在,学校主要将其作为一种授课内容。体育的目的还停留在对身体锻炼和身体健康的追求上,没有触及教育本身。体育仅仅作作为一种独立的身体活动方式存在着,而不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对于体育活动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锻炼身体与追求身体健康上。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美国传统教育受到了实用主义浪潮的冲击,有用即真理变得尤为重要,以往强调的从纪律、分工、智育的教学教育理念开始逐渐被自由、民主、游戏、个性所取代,而对于人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20世纪60年代,著名身体哲学思想家戴维斯(Davis)和吉哥拉(Zeigler)试图超越哲学与体育本身,建构一种纯粹而又独立的体育哲学观,其代表作《体育的哲学过程》《体育、健康和休闲教育的哲学基础》更是开启了这一时期对体育的哲学反思。不同的哲学派别都加入了推进体育哲学发展的行列,如实用主义(Pragmat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等等。这些哲学学派在丰富和发展体育哲学的同时,也在扮演着体育的终结者角色。体育沦为哲学的附庸,体育本身所蕴含的哲学意蕴被无限夸大,而体育本身就被终结,体育哲学陷入体育的空场之中,而这样的体育哲学研究也遭人诟病。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资本社会所蕴含的体育的特质,现代体育运动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商业化行为。体育产业和职业体育的开展意味着现代体育运动开始揭开羞羞答答的面纱,直接成为赤裸裸的商业模式。经济利益成了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经纪人和体育官员追求的目标。运动员们为了金钱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沉迷于胜利带来的巨额经济财富;兴奋剂开始泛滥,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追求被不择手段地攫取高额的经济利益所取代。现代体育在商业化的同时,也沦为灌输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工具。早在20世纪早期,法西斯主义被体育领域所接受。其时,德国体操协会的领导人埃德蒙·诺伊恩道夫曾经在恭喜希特勒成为总理的同时,宣布德国体操运动员将和希特勒的突击士兵一样与其共同进退。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被称为一场“现代体育与纳粹主义结合”的运动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有一些国家将体育作为向群众灌输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工具。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者统治着大部分的民众,这种情况在体育中也得到了反映。美国的激进分子哈里·爱德华兹揭露美国体育机构是独裁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结合,以他为首的一些人反对任何机构对体育的滥用,也反对体育机构本身。他们认为现代体育其实就是一种堕落,从教练到体育教育者到管理层都是如此。

人需要自由。没有自由,人就是两脚动物。^[4]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往往被异化成为一份薪水,而运动员则被异化成为10秒人或11秒人。每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人们关注得最多的就是金牌

榜,唯“金牌论”将体育异化进一步推向深渊。体育活动被异化成为对打破“记录”的无限追求;运动员的本真诉求被压抑,运动员能否给观众满意的成绩成为衡量运动员优秀与否的标准,当观众不再满足其冠军头衔的时候,运动员只有通过打破“记录”来获得观众的喜爱。至此,运动员已被异化为一种取悦观众的工具。

瓦奈(Vinnia)在《足球躁狂症》中论述了球场内外的不同,他引用了“异化的生产”的概念。瓦奈批判性地审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所有行业的影响,当然也包括了足球。他把重点放在了现代足球对于塑造意识形态的影响上。瓦奈在探讨了自恋、侵略和军国主义的基础上,广泛地讨论了足球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他用新马克思主义的体育批判观非常详细和深入地分析和批判了现代体育。^[5]

在现代社会,体育绝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消遣活动,它没有摆脱以生产力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的制约,它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娱乐、游戏、消遣。黑施特(Richter)在《右翼社会中的健身国家与体育》一书中强调,体育是一种由它所属的社会结构塑造出来的高水平的表演型运动。体育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的,也不会抵制和改变现有社会,而是用来支持现代社会的;体育绝不是一种和政治无关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体育运动员容易被“小恩小惠”所操纵,因而体育竞技往往被资本家操纵;虚假的体育消费形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成为大众文化的盲目消费者。体育世界和整个世界一样,既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既可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也可能使全人类异化,甚至可能使全人类变得残暴。

在《体育:测量时间的监狱》中,布鲁姆(Brohm)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体育在意识形态上再造了民主选举、统治集团、屈服和服从等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二是体育传播着竞争、记录和成绩等特定体育机构的意识形态;三是体育也大规模地传播着超人神话,个人主义,社会成就、成功和效率等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体育是一种建立在“健康”的幻想上所进行的身体的生产,运动员成为了被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机器人,可以说体育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主题机器。当然,布鲁姆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阿尔都塞(Althusser)对马克思有关体育的详细阐述。阿尔

都塞认为,个人改变世界的能力有限,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了人们的选择以及对他们所处世界的理解。

三 人的全面发展是身体哲学的未来走向

体育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但是我们总是忘记了体育的意识形态功用。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对主体具有一定的作用,是一种有用的意识,它离开了主体的意识形态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不能独立存在,意识形态需要主体,它是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主体来建构某种功能,例如,把社会生活的大部分人都塑造成某一种样式,让个体变成具体的个人。^[6]体育是艺术的分支,但是我们很难将体育与思想联系起来,体育一般被看作一种身体活动,是一种对身体本身的获得。就这样,体育的重要功能被遗忘,我们在重新解读体育的时候,应该更多地去思考体育对于自身所具有的关乎意识形态的那一部分。运动员身体活动能力在不断地被超越的同时,实际上更多地感受到的是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在运动场上,我们会关注胜利者的欢乐、愉悦,却很少去关注失败者的苦涩与痛楚。在球场上,因为一分之差,胜者手舞足蹈、欢乐开怀,而失败者却一脸落寞、懊恼不已,一直在不断地检讨和思考其失败的原因,甚至也许一个球的失败会成为运动员一辈子的遗憾。因此,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关注愉悦,也应该关注落寞。因为这都是体育运动给人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7]

在运动的过程中,运动员的意识、知觉是决定其运动成绩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但是他们的非理性意识却时常困扰着他们。我们经常听到有运动员懊恼地说:“我意识到了,却没有做到。”能够把意识到的东西做出来,并把这些“意识”到的变成“非意识”的东西不假思索地做出来,可以说是比赛场上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在运动过程中,运动员要经验空间。比如一个运动员很难去具体地体会100 m的长度、5 cm的高度、50℃的角度是什么概念,但是他却总是能感觉到:什么是长,什么是短,什么是高,什么是矮;他的对手是在他的左边,还是右边;对手是左手比较厉害,还是右手比较擅长;在百米冲刺的过程中,是对手从后面赶超过来,还是自己即将超过前面的对手;他与对手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或者多近。总之,他们很容易去感

觉到“远”“近”“左”“右”“高”“低”“前”“后”等空间的特殊性。这些不仅仅是牵涉身体的地点或者位置,而是运动员以其自己的身体为经验基础,不断地和比赛时的情境进行关联,于是就形成了活生生的生活经验。这种生活空间的经验,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主体性空间(subjective space)。运动员获得的经验,即他对他周围的人或环境的感知,是通过他的身体得来的,他们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参照物,于是就会产生“我在哪儿”的具体感觉,从而判断对方是在他的“左边”还是“右边”,“前面”还是“后面”。

卢梭说:物体有两种运动,那就是因他物的影响而发生的运动和自发的或随意的运动。^[8]根据卢梭的理论,我们可以将运动分为存在于运动物体之外和运动物体之内的两种。我们的身体在运动的过程中经验到的身体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例如,人们进入同一体育馆,虽然客观的空间和场地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体育馆内空无一人或者体育场内坐满了观众,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面对同一座体育馆,作为观众进入,还是作为比赛运动员进入,给予人的身体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身体经验不同的周围环境,形成一种身体与环境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是作为主体性的空间而存在的。比如,我想运动我的胳膊,我就可以转动它,这里应该是我意志占据主要作用。如果人的活动中没有任何自发性,如果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通通没有任何自发性,那么人们就很难想象运动是存在于物体之外的运动。

在体育研究或者运动训练过程中,我们总是很容易找到时间的表述方式,比如:在首届现代奥运会(1896年)上,在100 m短跑决赛中,“蹲跪式起跑”尚未普及,参加比赛的5名运动员的起跑方式各有不同。其中,只有美国的运动员托马斯·伯克采用“蹲跪式起跑”方法,在预赛中以11秒8的成绩创造了第一个男子100 m短跑的奥运会纪录,并获得了奥运会史上第一个100 m短跑冠军。在斯德哥尔摩奥运会(1912年)上,全部短跑金牌被美国队包揽,其中,多纳德·里平科特在男子100 m短跑预赛中取得了10秒6的好成绩,国际田联批准这一成绩为100 m短跑第一个正式的世界纪录。博尔特在柏林田径世界锦标赛(2009年)100 m短跑的决赛中以9秒85获得冠军,再次大幅度刷新了100米短跑的世界纪录。博尔特创造的这个纪

录,成为进入电子计时时代后第一次以超过0.1秒的方式打破的纪录。^[5]

我们对运动员比赛成绩的时间上的计数,以及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所感觉到的时间和运动员在现实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比赛的过程中,运动员只要听到比赛枪声一响,就能感觉到比赛的开始,他知道自己必须快起来,他必须超越前面的对手,他必须超越过去的自我,现在是他最高兴的时候,胜利将在他进入终点的时候停留在他的脑海中。他的身体一直在经验着“快”“慢”“远”“近”“开始”“结束”等感觉,这些感觉使得运动员的生活丰富多彩。在比赛的过程中,运动员的身体或者感觉到遥遥领先于他人,或者感觉到他即将被后面的人所超越;他或经验到自己身体的飞速前进,或经验到他人身体的快速超越,他在“前进”和“后退”中体验到时间。由此可知,运动员的身体并不是被动地投入到“时间”与“空间”的映射中的,他们主动地介入到“时间”与“空间”中;在运动的过程中,他们的身体已经具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介质。当球员看到朝他飞过来的球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伸出双手;去接住球的过程,或者他不知不觉地躲闪的过程,体现出身体的主动性;伸出双手去接住球,还是摇摆身体去躲避球……我们往往把这一身体活动归结为身体对于球的袭击的一种具体活动。

所谓抽象活动则是指那些已经计划好的运动,通过计划、设计,最后形成一定的方式方法的过程。比如,在比赛之前,教练员要给运动员作一系列的比赛的方式、方法的培训,要制订计划,要规定在什么时候进行进攻,什么时候防守,等等,而这些都属于抽象活动。具体活动是人们身体最直接的反应,是一种生活层面的表现,是未经思索的一种身体经验内容;抽象活动则是一种“思想”层面的内容,是人们在经过有意义的思考之后所做出的一种通过身体去实现的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人们不仅仅经历了客观存在的空间与时间,还通过了抽象的思维活动以及设计与计划,并且分析了经验层面的客观知识。作为经验的主体,人们对世界的经验,都是基于对世界中的对象,包括自我、他人、环境的感受、知觉、想象、猜测、知觉,不断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不管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杜威(Dewey)的“原初经验”,胡塞尔的“操作意向性”(operative intentionality)或梅洛-庞

帝的“非反省性经验”(unreflective experience)、“知觉的信仰”(perceptual faith)、“先于客观的经验”(per-objective experience)、“先于历史的存在”(pre-historical existence)或“先于意识的意识”(preconsciously consciousness)等,都是主体构成活生生的身体经验的过程。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9]体育活动让主体变成了活生生的身体经验的体验过程,这样的体育活动导致了人的异化。身体的活动终止被认为是一切竞技类活动的终止,身体的活动被看作是单纯的体育运动甚至是竞技类比赛。可以看出,异化的体育使人压抑,而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的身体活动则让人得到解放。在异化的体育中,人们往往忙于算计,以强凌弱、弄虚作假、诡计多端、表里不一、营私舞弊、老谋深算、尔虞我诈、阳奉阴违……这与本真的身体活动背道而驰。现代精神不由终结于纯粹的权力意志之中的主体主义的狂热来理解。对于现代精神来说,自身性的一切客观条件都失效了。^[10]摆脱这些条件,才能明白人是什么。人追求的是真正的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快乐,而不是把身体活动看作是获得利益的工具。对于当今世界,如何回归到身体活动本身是最为重要的身体哲学命题。

参考文献:

- [1] 张之沧. 后现代身体论[J]. 江海学刊, 2006(2): 25-30.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75.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5.
- [4] 陈先达. 马克思主义信仰十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64.
- [5] PETER C. McIntosh, Sport in Society[M]. London: C. A. Watts, 1963: 61-85.
- [6] 高宣扬. 法兰西思想评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00.
- [7] 约瑟夫·马奎尔, 凯文·扬. 理论诠释: 体育与社会[M]. 陆小聪,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 21.
- [8] 卢梭. 爱弥儿: 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426.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8.
- [10] 迪特尔·亨利希. 自身关系: 关于德国古典中学奠基的思考与阐释[M]. 郑辟瑞,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54.

责任编辑: 蔡燕飞